

4
2000

实行抗
领导我
坚持真
斗争南



杨秀峰

杨秀峰冀南平原“逐鹿”记

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

谆谆教诲 受益良深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前后

周恩来的三次莫斯科之行

孙毅将军在保定

党史
博采
DANGSHI BOCAI

ISSN 1006-8031



9 771006 803001



邓颖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又名邓文淑，别名逸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WEI REN QING HUAI 伟人情怀



戎冠秀在一起。
难得又重逢——邓颖超与

FD28/14

WEI REN QING HUAI



1979年，邓颖超和著名女作家丁玲在一起。



1964年，邓颖超和蔡畅在一起。



党史

刊名题字：邓小平

主办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出版 / 《党史博采》

顾问

王 玉 王东宁 尹 哲
冯 征 石仲泉 张群生
李 锐 郑伯克 郑 惠
杨泽江 郭德宏 韩泰华

主任编委

王运芳

副主任编委

王桂兰 张维民 毛宇山

编委

王仲禹 朱 赤 阎恒兴
刘凤娟 吴清文 杜玉卿
张显忱 范文昭 杨荣顺
耿双全 傅凤阁 韩玉春

卷首语

每月要事【1】

本刊专稿

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 / 朱佳木【4】

全面推进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 / 赵金铎【7】

风展红旗

周恩来的三次莫斯科之行 / 于长治【12】

邓颖超与戏剧 / 阿 庚【10】

往事追怀

谆谆教诲 受益良深

——忆刘澜涛同志 / 董建中【16】

孙毅将军在保定 / 孙佐培【19】

深切怀念姬鹏飞同志 / 冯彩章 李葆定【21】

斑斓春秋

李立三帮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 李思慎【23】

杨秀峰冀南平原逐“鹿”记 / 南振国【25】

燕赵群英

五十四年未了情 / 张荣义 贾丽君 阎军平【30】

关注社会现实 · 品味历史沧桑

博采

月刊 2000 / 4 期



杂志社 发行 / 本刊发行部 国外总发行 /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博采专递

邹韬奋拒贿 / 毛泽东十年还旧债 /

周恩来的骨灰盒 / 革命前辈尊师佳话 /

毛泽东登广告 /【32】

珍闻轶事

谢觉哉延安判案记 / 黄栋法【35】

谭震林——中国第一位苏维埃政府主席 / 马宏骄【34】

老区纪行

支离白骨听诉说 / 潘楷【37】

飘扬在红土地上的旗帜
——华北联大在平山 / 康彦新 王翠平【38】

历史写真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前后 / 左宝【42】

理论纵横

陈云思想方法理论探析 / 徐淑贞【44】

业务研讨

如何编写地方党史史稿 / 朱赤【46】

社 长 杜玉卿

副社长 张占军 刘德龙

副总编 杜丽荣

编辑部主任 项东民

美术编辑 侯梦玮 郭晓丽

社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265 号

邮编 050071

电话 (0311) 社长室 7054193

副总编室 7054192

编辑部 7041637

广告发行部 7041637

制作 《党史博采》电脑设计工作室

印刷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栾印刷厂

讴歌千秋伟业 · 弘扬时代精神

每月要事

- 1928.4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 1929.4 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 1936.4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西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 1938.4 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 1943.4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 1944.4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 1945.4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列入党章。
- 1946.4 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邓发同机罹难。
- 1948.4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 1949.4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灭亡。
- 1950.4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1954.4 中匈两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 1955.4 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 1956.4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 1957.4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 1965.4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准备抗美援朝。
- 1966.4 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 1969.4 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列入党章。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 1970.4 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 1976.4 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 1977.4 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
- 1980.4 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在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
- 1981.4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198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颁布。
- 1985.4 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1987.4 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 1988.4 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李鹏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万里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议。
- 1990.4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轨道，这是我国第一次为国外发射商业卫星。同月，中央同意开发、开放浦东。
- 1993.4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当年10月1日起实行。
- 1995.4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通知。4月10日，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
- 1996.4 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发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
- 1997.4 彭真同志在北京逝世。
- 1998.4 江泽民在北京大学考察工作时指出，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史

刊名题字：邓小平

主办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出版 / 《党史博采》

顾问

王 玉 王东宁 尹 哲
冯 征 石仲泉 张群生
李 锐 郑伯克 郑 惠
杨泽江 郭德宏 韩泰华

主任编委

王运芳

副主任编委

王桂兰 张维民 毛宇山

编委

王仲禹 朱 赤 阎恒兴
刘凤娟 吴清文 杜玉卿
张显忱 范文昭 杨荣顺
耿双全 傅凤阁 韩玉春

卷首语

每月要事【1】

本刊专稿

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 / 朱佳木【4】

全面推进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 / 赵金铎【7】

风展红旗

周恩来的三次莫斯科之行 / 于长治【12】

邓颖超与戏剧 / 阿 庚【10】

往事追怀

谆谆教诲 受益良深
——忆刘澜涛同志 / 董建中【16】

孙毅将军在保定 / 孙佐培【19】

深切怀念姬鹏飞同志 / 冯彩章 李葆定【21】

斑斓春秋

李立三帮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 李思慎【23】

杨秀峰冀南平原逐“鹿”记 / 南振国【25】

燕赵群英

五十四年未了情 / 张荣义 贾丽君 阎军平【30】

关注社会现实 · 品味历史沧桑

博采

月刊 2000 / 4 期



杂志社 发行 / 本刊发行部 国外总发行 /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博采专递

邹韬奋拒贿 / 毛泽东十年还旧债 /

周恩来的骨灰盒 / 革命前辈尊师佳话 /

毛泽东登广告 /【32】

珍闻轶事

谢觉哉延安判案记 / 黄栋法【35】

谭震林——中国第一位苏维埃政府主席 / 马宏骄【34】

老区纪行

支离白骨听诉说 / 潘楷【37】

飘扬在红土地上的旗帜

——华北联大在平山 / 康彦新 王翠平【38】

历史写真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前后 / 左宝【42】

理论纵横

陈云思想方法理论探析 / 徐淑贞【44】

业务研讨

如何编写地方党史史稿 / 朱赤【46】

社 长 杜玉卿

副社长 张占军 刘德龙

副总编 杜丽荣

编辑部主任 项东民

美术编辑 侯梦玮 郭晓丽

社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265 号

邮编 050071

电话 (0311) 社长室 7054193

副总编室 7054192

编辑部 7041637

广告发行部 7041637

制作 《党史博采》电脑设计工作室

印刷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栾印刷厂

讴歌千秋伟业 · 弘扬时代精神

2000.4.25

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

■ 朱佳木

在去年年底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胡锦涛、曾庆红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尤其是庆红同志反复强调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的问题，我想就此谈一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有人统计过，庆红同志这篇讲话稿不过4000字，但“政治”一词出现十余次之多。为什么中央领导同志在讲到党史工作时，如此突出讲政治的问题？我理解，这是因为：第一，党史学既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同时又不同于语言学这种没有阶级性的学科，甚至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科。它是一门党性极强的学科，本身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相反，只有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业务与政治的关系，用正确的政治观点进行党史研究和宣传，党史学科才能建设好。第二，当前，全党从中央到县级领导班子都在开展以讲政治为核心的集中“三讲”教育。中央和各级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修史部门或工作部门，肩负着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任，更要牢牢把握好政治方向。强调党史工作要讲政治，与江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讲政治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与党中央关于进行“三讲”教育的决策是一致的。第三，强调党史工作要讲政治，与当前思想政治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不讲政治，甚至讲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的状况有关。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讲到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时，多次指出，有人在报刊书籍中发表歪曲党的历史、诋毁毛主席和党的优良传统的错误文章；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正在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其中包括通过民运分子制造丑化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的舆论，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可见，现在强调党史工作讲政治，



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对我们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那么，在党史工作中应当如何讲政治呢？我理解，看党史工作是不是讲了政治，有多方面的衡量标准，当前主要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来看：

一、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工作。所谓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说过：“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具体讲到对毛泽东和建国后历史的评价时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

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他还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工作,那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宣传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历史。

二、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严格地以《历史决议》和新时期历次党代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结论为准绳。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党史工作要服务大局,就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有丝毫的偏离;就必须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是党在总结领导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在党史研究中,《历史决议》和党代会的决议没涉及的问题固然要研究,即使涉及了的也可以继续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当在遵守《历史决议》和党代会结论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根据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向上级直至中央提出,但在中央未作出新的结论之前,不得随意发表。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诸如党对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右斗争,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明确地作出过科学的论断。我们在进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发表成果时,应当自觉地遵循而不应当有任何的违反。

三、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十分注意维护党的形象。江总书记在前年写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庆红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要体现我们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每一段历史怎么

写,每一个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怎么评价、怎么宣传,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党的形象,切不可掉以轻心,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在当今世界上,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研究单位、高等院校,都有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和人员。但是,他们搞研究和我们搞研究,立场、目的是不同的,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往往会截然相反。我们进行党史研究,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因此一定要自觉地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满腔热情地讴歌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设国家的丰功伟绩。对于探索中的缺点和错误、挫折失败,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并深刻总结其中的教训,用以警示后人。但绝不能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冷嘲热讽,甚至津津乐道于阴暗面,大作反面文章,以偏概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最近著文说,不少学生在谈他们一度产生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想法时,都提到这是受了某些书籍报刊关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净是错误的说法的影响。这一反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四、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必须从全党工作大局出发去认识、分析、处理问题,在事关全局,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的问题上,加强向上级的请示汇报。为什么要请示汇报呢?一是因为,党史工作中涉及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影响全局,给党的事业造成被动。二是因为,中央和各级党史研究室是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它与民间学术团体不同,也不是学者组成的独立研究机构。凡是以单位名义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客观上都会被看作是代表该单位所隶属的党委的意见,如果出了问题,势必影响到党委,给党委造成被动。因此,遇到重大问题时,事先向党委请示汇报,是党史工作部门应当遵守的纪律。即使是个人署名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只要涉及到重大或敏感的问题,也应当事先向领导请示汇报。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五、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要加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乔木同志生前曾经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党史工作者,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同志一样,必须站在与这种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

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当前，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仍然很复杂，有时还是尖锐的。江总书记多次提醒我们，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会去占领。在这场斗争中，党史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对于否定、歪曲、丑化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言论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应当根据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部署，用科学的态度、扎实的材料、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方法，批驳各种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发挥党史工作部门的独特作用。

六、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要进一步强化党史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小平同志经常强调，要用党史教育青年，使它成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江总书记也说：“一个领导干部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领导班子的“三讲”教育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要求各级配备跨世纪的领导干部。这些都为党史工作者在科研基础上开展党史的宣传教育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多出成果，出多种形式的成果，为党史工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七、党史工作要讲政治，就必须加强对党史出版物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打破了许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设置的障碍，涌现了大批政治导向正确、学术水平较高的成果，党史书籍、刊物也因此而空前繁荣起来。但应当看到，也有的书和文章对党的历史任意捏造，对党的领袖人物随意褒贬，甚至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刻意追求奇闻轶事。对此，党史工作者应当协助党和政府的主管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出版管理工作，同时对自己的工作也要进行认真清理整顿，进行自我约束。许多事实说明，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不好的作品的出现，往往同党史工作机构个别同志的错误参与是分不开的。

强调党史工作要讲政治，会不会妨碍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会不会影响党史界出成果出人才呢？不会的，因为党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与学术是能够辩证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要加强它的政治性就必须加强它的科学性，反之亦然。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党史工作中政治与学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不仅不会影响出成果出人才，相反，会给党史界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提供更好的条件，给党史界人才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氛围。

责任编辑：杜丽荣

199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和支持下，全省各级党史部门紧紧围绕全党工作的大局，发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党史编研和党史资政育人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全省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一年来，各级党史部门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党史书刊，撰写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理论文章，由我省推荐参加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党史系统前列。与有关部门合作拍摄的党史教育电视片，为庆祝建国50周年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特别是在全省开展的“三讲”教育中，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编印“三讲”内部学习资料、撰写专题文章等多种形式，积极配合全省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对推动“三讲”教育的深入进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省各市、县通过贯彻落实省委颁发的《河北省党史工作条例》，在党史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这里，我代表省委向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的全省党史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特别对关心支持和指导帮助河北党史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世纪交替之年，也是完成“九五”计划和本世纪末重要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对于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好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史工作的指示精神，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努力开创党史工作的

全面推进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

■ 赵金铎



新局面。为了落实好中央领导有关党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做好世纪之交的我省党史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地位

党史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党的全局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98年10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亲笔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出了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重要地位，对党史工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并寄予殷殷厚望。1999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又接见了参加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的全体代表。他在讲话中要求党史工作者“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努力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党史研究成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迎接新世纪和建党80周年的到来”。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在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也深刻阐述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让党史研究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前50年，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需要。因为不学习党史，不研究党史；不了解党史，就不能真正懂得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产生，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实践是一体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建国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科学总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善于总结历史

经验,通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的贯彻,在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文明建设等方面,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党78年的历史,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10年的历史,确实是一部蕴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真正把党史作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这是各级领导干部担当起跨世纪重任,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各级党委、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都要增强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党史工作搞好。

二、做好世纪之交的党史工作,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

今年是世纪交替之年,明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十五”计划的头一年,又将迎来建党80周年。可以说,今明两年是党史工作难得的历史机遇。各级党史部门要按照中央领导对党史工作的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

首先,党史部门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中要力争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党史的专业特色和社会功能,积极担负起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责任,要从史的角度,通过

深化党史研究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把党的历史中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展现出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熟悉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使他们从党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和受到启迪,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全面理解和掌握,真正把全省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上来。

其次,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发挥党史这部“活生生的教科书”的教育作用,是党史部门工作的责任。要通过编纂高质量的党史书籍、摄制电视教育片、举办展览、讲座等多种形式,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正在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帮助他们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从党史中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工作中少走弯路,避免重犯和少犯错误。要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史征编研工作,认真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全省党史部门要加强谋划和研究部署,紧紧抓住党的中心工作和热点问题,按照制定的工作规划,多出精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明年是建党80周年,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一批党史研究的献礼项目。

再次,党史部门要解放思想,

树立创新意识,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改进工作方式。目前,党史工作的重点已转入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征编研上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涵盖的内容多,涉及面广,难度更大,任务更重,需要党史部门开动脑筋,克服畏难、无所作为的情绪,闯出一条新路。要着眼于工作领域的拓展,自觉主动地把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党史研究的范畴,从中总结出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党史研究工作的产品是精神产品,面对当前的文化市场,要树立精品意识,注重社会效益。这些都需要党史工作者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样,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广。

三、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党史工作队伍

跨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党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提高党史队伍的素质已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重要问题。

第一,党史工作者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和理论素养。“党史工作无小事,做好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这是对每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党史工作者要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处理党史和党史工作中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史工作中政治与学术、政治与业

务、研究与宣传的辩证关系,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要贯彻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原则和精神,反复学习领会三代领导核心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反复学习领会邓小平的历史观、党史观和研究党史的方法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

第二,党史工作者要有较高的业务素养。经过多年工作实践,全省党史工作者在史料征集、党史研究、党史宣传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业务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但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必须在业务素质的提高方面下工夫。党史工作,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内容丰富。党史工作者除了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之外,必须通过刻苦钻研党史业务,重点使党史研究能力再提高一步。要更多地接触社会实践,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特别要熟悉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的要求。

第三,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党史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同时又是一项默默无闻、寂寞艰辛的工作。长期以来,党史部门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好传统,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爱岗敬业,清苦修史,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党史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重要思想保证。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党

史队伍,这就给我们的内部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各级党史部门必须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高州市重要讲话的要求,通过深入不断地开展“三讲”教育,切实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通过学习理论、研究党史,引导党史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抵御不良风气的能力。要加强机关纪律,增强内部团结,真正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努力造就一支党性坚强、思想过硬、爱岗敬业的党史工作队伍。

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

党史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要管党”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在学习了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后,应该把自己对党史工作的认识再上升一个高度,深入一个层次,把目光放得更远、更宽一些,按照中央提出的“各级党委要继续把党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明确要求,不但从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切实给予党史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

首先,要加强对党史工作政治上的领导,把好政治关。对地方党史上的重要问题,如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重要书刊、著作的出版,都要认真审定,不能出政治性差错。第二,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要继续贯彻好中央关于党史工作要“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的要求,贯彻好省委颁发的党史工作条例。要为党史部门配备好符合跨世纪要求的、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强的领导班

子,特别要选好主要负责人。要把好进人关,选拔那些政治强、作风正、熟悉和热爱党史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从事党史工作,并保持队伍骨干的相对稳定。由于党史工作涉及面广,仅靠党史部门是完不成任务的。各级党委要统一调配力量,以党史部门为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开展好部门协作,共同做好这项工作。第三,要切实关心党史工作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主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级财政紧张和其他原因,党史部门的工作条件普遍比较差。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分管书记要主动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针对党史研究成果因缺乏经费不能出版印刷这一突出问题,各级财政要挤出一些钱来,支持党史著作的出版,使这些成果早日问世,发挥其社会效益。

同志们,党中央对党史工作十分重视,也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各级党委把党史工作真正重视起来,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把我省的党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丰硕的成果迎接新世纪和建党80周年的到来。

责任编辑:杜丽荣



邓颖超与戏剧

■ 阿庚

《刺杀伊藤博文》等，邓颖超在前者扮演花木兰，在后者扮演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

1989年，我们在天津戏剧博物馆（即原广东会馆）拍摄电视连续剧《郭隆真》时，一进门，就看到邓颖超为“戏博”题写的匾额：“天津戏剧博物馆”七个刚劲有力的大字。那天，我们在馆内古戏楼拍摄郭隆真与邓颖超组织义演的一组镜头，亲眼看到了邓大姐当年演戏的这个舞台。经“戏博”黄馆长介绍，邓大姐当年除演出《花木兰》、《刺杀伊藤博文》外，还演出了戏剧家熊佛西创作的话剧《新闻记者》。当时由于受社会上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女不能同台，邓大姐在剧中女扮男装饰演胡记者，她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很有味道。“戏博”展厅曾展出了这幅“胡记者”的剧照。黄馆长还对我说，邓大姐很会演戏。据邓大姐的密友王贞儒的弟弟王长儒老人回忆说：“在《刺杀伊藤博文》中，邓大姐扮演的朝鲜人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伊藤博文，她的表演极为勇敢。”王长儒还谈到《新闻记者》：“扮演者为天津‘女星社’社员（女星社，即于1923年4月在天津创办的从事妇女运动的一个进步团体，邓颖超为该社第二届总务部书记兼教育部委员），排演三星期，极为纯熟，表情甚佳，想必为天津人士所乐观者也。剧目而外，尚有唱歌、火棒、双簧，以助兴趣云。”

邓颖超常说天津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在1983年9月6日来津看望南开中学师生，在礼堂

讲话时说：“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天津度过的。我在天津读书，创建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对天津这个地方有深厚的感情，可说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五四运动时我来这个礼堂开过会。南开学校的话剧在当时很有名气，我也来看过戏，现在你们还搞话剧吗？这个传统应该继承下去。周恩来同志是话剧的倡导者，戏剧大师曹禺也是南开有名的学生……”

邓大姐还曾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院35周年晚会上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过去也当过演员，我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在剧团里，在五四运动时，光讲演不行呀，还得演戏。那时我们就演了一个《花木兰》，演了一个表现朝鲜爱国故事的《刺杀伊藤博文》。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要按现在的眼光看，那不叫话剧，那叫‘文明戏’。开始排戏的时候，我就受到了这样一种启发，就是你的台词一定送到剧场最后一排人，使观众一定能够听的清楚。现在我可以跟你们透露一下了，我们那时演戏，什么人来做我们的导演呀，什么人来做我们的舞台监督呀，没有人，就是我们学生自己。我们女学生演戏，男学生来监督，男学生里头有个周恩来，他还邀了几个人，坐到剧场里的楼上最后一排。话剧的优点和特点一定要发扬。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斗争的艰苦”

邓颖超同志爱看表现现代生活的戏，也非常爱看历史剧。她曾对同志们说，看历史剧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斗争的艰苦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一些女校学生曾积极组织演剧活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邓文淑（邓颖超）便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当时，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为中心，在“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坚分子、女师第十一班学生邓颖超的组织下，学生们满怀激情地开展这项工作。

邓颖超在“演讲队”任队长，同时组织大家演新戏。后与周恩来等组成爱国组织“觉悟社”，使宣传活动更加正规。他们在南门外广东会馆的古戏楼（也叫歌舞台）上演出了话剧《花木兰》和

性，受到很好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但现在有些历史剧不尊重历史，质量粗糙，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邓颖超认为，编好、演好历史剧，首先材料必须准确。她说：用文艺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历史剧目有其独特的作用，它是以史为鉴，让后人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受到教育，增加信心，得到鼓舞。因此怎么对过去的历史反映得真实、准确，是非常重要的。而剧作者、导演和演员都要采取认真的态度，对事实都要多做刻苦认真的研究，然后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在编写历史剧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史料进行取舍，应有些必要的艺术夸张，也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基本上要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是文艺作品，允许虚构而过分脱离历史背景，从而失去了真实感。邓颖超说，文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能浪漫得不着边际。历史剧的虚构有着制约性。剧作者和导演不能单凭热情进行创作，更不能从个人的主观心愿和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喜好而随意虚构。她举例说，有些戏描写战士在临终前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还说了很多“遗嘱”。或者，描写战士死后，从他的口袋里找到入党申请书，而战士活着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表示过入党的要求。战争生活是严酷而紧张的，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或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工作的时候，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在那样的环境里，哪可能有时间容你

说那么多的话，正像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掩埋好同志的尸体，踏着同志们的血迹，又勇敢地继续前进了。革命战士的心中只有仇恨、愤怒，不可能有那么多悲哀的抒发和情长意绵的对话。

关于尊重历史真实性的问题，邓颖超还说，不顾历史的条件，以今天的思想、认识和观点去要求过去，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目前写好、演好革命斗争题材的戏，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有一些当事人还活着，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剧作者、演员可以

找这些人了解情况，这些当事人也具有向他们介绍情况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编写历史剧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搞创作的人一定要掌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坚持这样做，就会写出人民喜爱的戏剧和各种文艺作品。现在有些历史题材的剧本，不实事求是，编写得太离奇了。

曾有人推荐邓颖超观看一个话剧，内容是描写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其中有一场是写“四·一二”以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周恩来从上海去武汉，与邓大姐在黄浦江边告别。剧中描绘邓大姐向周恩来谈到他们的孩子死了，周恩来表示心情很难过，话别的



▲邓颖超在《新闻记者》中的化妆照

时间很长。事实上，周恩来离开上海的那天夜晚，邓大姐不但没有去送别，而且根本没有下楼。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离开上海又十分秘密，根本不允许送别，更没有时间谈个人儿女情长的私事。剧本编得显然不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人物的心情。邓颖超对此曾发表看法：“那时我们根本顾不了孩子。历史剧要符合历史，脱离了事件的基础搞浪漫，就会浪漫得无边无际了。”剧中还有一场是描写南昌起义的，剧中出现一位女同志向周恩来报告邓大姐失踪了，她要去找，周恩来说你不要去了，我自己去找。邓大姐看后说，剧情编的太离奇了。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前线指挥，哪能想到去找妻子，这完全是不可

■ 于长治

周恩来的 三次莫斯科之行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周恩来有过三次莫斯科之行。这三次充满曲折、惊险和艰辛的莫斯科之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凝重的一笔。

出席六大 一行莫斯科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为了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且比较充裕的时间里，认真总结国内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的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定在1928年6月举行。周恩来是会议的

正式代表，邓颖超是列席代表，接到中央通知后，他们决定一同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初的一天，在上海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准备动身，突然被告知，他们的住处已被敌人察觉，中央要他们立即转移，并乘机前往苏联。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马上销毁文件，顾不上带其他衣物，便匆匆离开住所，登上一艘开往大连的日本客轮，离开了上海。这时周恩来留着长须，身着长袍，打扮成一名古玩商人的模样，邓颖超则身着一件半新的旗袍，装扮成一位随夫而行的家庭主妇。

为了避人耳目，保证安全，他们买了头等舱的船票，只是由于走得匆忙，身着半新不旧的衣服，这和坐头等舱的阔人身份有些不大相称。而且按照当时的惯例，坐头等舱的客人，一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每餐都要到餐厅用餐，可他们没有衣服更换，每次用餐总是那一身衣服，这样就逐渐引起了旁人的注意。

船过青岛，进行短暂停息，旅客可以上岸买些东西。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才顺便上岸买了几件顺时的衣服，又买了不少报纸带回船上，准备路上翻阅。但这样一来，更引

能的事。而且那时候，我在汉口是秘密党员，上哪儿去找呢？

邓颖超同志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写历史题材的戏剧，也不能编得太偏离这一指导思想。

此外，邓颖超还谈到，不要

以为某个剧本是写我们党的领导人，于是，不管好坏，就谁也不敢提意见了。如果不管其思想内容如何，艺术质量如何，只要是表现革命领袖或是某个伟人，就可以通行无阻，被评为奖，这是很不好。凡是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剧，更应当采取慎重严谨

的态度，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查，同时也要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除上述几点外，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正确宣传历史和教育后人的目的。

责任编辑：安燿辉

起了船上日本密探的怀疑:这对商人夫妇,为什么会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一天多之后,轮船到了大连,周恩来和邓颖超刚要上岸,突然有几个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围了过来,对他们进行盘问。其中一个小头目首先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周恩来不慌不忙地回答:“做古玩生意的。”“做生意的?那买这么多报纸做什么?”小头目气势逼人地问,“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打发时间。”周恩来回答得很平静。一旁的邓颖超灵机一动,马上插言道:“我们先生不光做古玩生意,也做股票生意,报上天天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看啊!”这句话说得合情合理,堵得日本警察无言答对。日本警察没有办法,只好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邓颖超被安排到一个旅馆。

到了警察厅,日本人再次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职业和学历。周恩来则按预先想好的内容又平静地回答了一遍。一个警官冷不丁地问:“你到东北究竟要做什么?”“来看舅舅。”“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姓周,叫周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警一听他有亲戚在吉林省府工作,态度有些好转,但还是不停地追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冷冷一笑:“在中国甥舅姓氏不一样,不像欧美,舅舅和叔叔都是一样的称呼。所以,我姓王,舅舅姓周。警官先生,你也是东方

人,又在中国工作,应该清楚中国的习惯。”日警被周恩来顶得十分狼狈,便气急败坏地说:“我看你不是姓王,是姓周!也不是做古玩生意的,是握枪杆子的!”这一下把他们心中怀疑的老底全倒了出来。周恩来听了反而更加坦然。他伸出自己那双修长白皙的手,微微一笑:“警官先生,你看这像握枪杆子的手吗?”那警官见从手上看不出什么破绽,就打开抽屉,取出几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猛地嚎叫了一声:“你不要再隐瞒了,你是周恩来!”周恩来见状泰然一笑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和周恩来有什么相干?你不要认错了人,耽误了别人的事情!”这句话软中带硬,笑声中又含着某种威严。日本警官这时确实拿不出什么有力证据,手中的照片还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的旧照,一身戎装,年轻英俊,和眼前这位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十足的大商人实在是对不上号。他在周恩来的气势下软了下来,挥挥手说:“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现在可以回旅馆,你太太还在旅馆等着你。”周恩来这时反而并不急着走,慢慢笑着说:“那还得麻烦你们一下,请给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并请把票给送到旅馆去好吗?”日本警官只得接过钱,口中还连连道着歉……

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便投入了紧张的“六大”筹备工作。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会议由瞿秋白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6月30日,周恩来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大会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两个重要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党在组织和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方针政策。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19日,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六大后的两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

党的六大,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严肃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正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策略方针等许多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周恩来为大会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也就庄重地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远方汇报 二行莫斯科

1930年3月,受中央派遣,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时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结合处理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意见分歧,独自开始了第二次莫斯科之行。他从上海动身,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买了到欧洲去的船票。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颠簸,5月上旬轮船靠岸,然后坐火